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者文库

服务贸易学研究系列

服务贸易评论

Review of Trade in Services

2014年·第1辑〔总第6辑〕

黄建忠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者文库
服务贸易学研究系列

服务贸易评论

Review of Trade in Services

2014年·第1辑〔总第6辑〕

主编：黄建忠

本辑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代中强 包 婷 刘 莉 庄惠明 汪 艳 张 慧
侯振楠 Xinzhu Zhao(赵馨竹) 黄建忠 谢 慧
满 超 蔡宏波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服务贸易评论. 第6辑/黄建忠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615-5176-9

I. ①服… II. ①黄… III. ①服务贸易-丛刊 IV. ①F740.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6744 号

官方合作网络销售商: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总编办电话:0592-2182177 传真:0592-2181253

营销中心电话:0592-2184458 传真:0592-2181365

网址:<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xmup @ 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1 插页:3

字数:350 千字

定价: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本辑收录的论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要素成本上升背景下我国外贸中长期发展趋势研究”(项目批准号:13JZD010)的阶段性成果

卷首语

在《服务贸易评论》第6辑付梓之际,主编人员的工作地也发生了变动,有的移驻上海,有的远赴大洋彼岸开展访学,但是显然地,他们更加靠近了新一轮开放的前沿地带。本辑收集的论文突出了服务业投资这一主题,既较为全面地研究了服务业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与竞争排斥效应,又相对深入地比较分析了外商投资在制造业与服务业地理聚集效应的联系及差别,同时还考察了在外商投资日益增多条件下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技术复杂度问题。此外,本辑论文还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变动之间的关系,外商投资与服务业工资差异的关系,服务贸易的内部管制壁垒等问题。可以说,文章的选题与研究具备了理论前沿性,在实践层面上也贴近了建立开放性经济新体系、加快自贸区建设等政策及战略要求,当能进一步引发学界同仁与实际工作者的深入思考。

黄建忠

目 录

中国服务业 FDI 效应研究

——基于技术溢出与竞争排斥视角 黄建忠 郑剑山 / 1

中国服务业吸引 FDI 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黄建忠 庄惠明 郑剑山 / 17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与服务贸易动态比较优势关系的

实证研究 黄建忠 包 婷 / 29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内和行业间地理集聚效应研究 张 慧 / 42

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工资差距

——基于中国城镇个人与行业匹配数据的实证分析 蔡宏波 刘杜若 / 58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技术水平与结构变迁研究

——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视角 侯振楠 / 70

知识产权保护、经济发展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代中强 梁俊伟 / 97

内向型管制的壁垒效应与服务贸易自由化 刘莉 黄建忠 / 113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国内管制:GATS 缺陷及其他路径进展 谢 慧 / 124

北京“职住分离”现象的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北京 CBD 地区为例 蔡宏波 满 超 / 136

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比较研究 汪 艳 周宝玉 / 152

针对来京留学生的抽样调查与分析 蔡宏波 Xinzhu Zhao / 162

中国服务业 FDI 效应研究

——基于技术溢出与竞争排斥视角

黄建忠 郑剑山^①

摘要:本文对服务业 FDI 技术溢出与竞争排斥效应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并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服务业 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确实存在,外资进入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各地区技术进步,促进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技术外溢效应也呈现地区差异,表现为对东部地区的技术拉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服务业外资的竞争排斥效应呈现非线性特征,即服务业引资相对规模必须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否则服务业外资对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将不再是正向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服务业吸引 FDI 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服务业 FDI;技术外溢;竞争排斥

一、引言

当前,世界经济已经步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领域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明显增加,服务业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中国自加入 WTO 以来,服务业 FDI 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据统计资料显示,2001 年中国服务业 FDI 的流入额仅为 111.8 亿美元,到 2013 年中国服务业 FDI 流入额高达 614.5 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近 5.5 倍,且于 2011 年首次超过制造业 FDI 成为中国引资新亮点^②。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国民经济陷入了被动发展的困境——即发达国家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通过对中国特定产业的直接投资和贸易模式的扭曲,将中国的产业体系牢牢锁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而由于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中的底端位置,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及增长的潜在后劲就难以得到有效提高。从这个角度上看,当前中国服务业外资大规模进入,或许服务业也存在这种被低端锁定发展的倾向。

因此,我们就需要思考: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服务业 FDI 究竟起到什么

^① 作者简介:黄建忠,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电子邮箱:jzhuang170@126.com;郑剑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要素成本上升背景下我国外贸中长期发展趋势研究”(2013JZD010)。

^②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资料整理所得。

样的作用?服务业FDI能否产生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促进地区技术水平提升,带动我国服务经济发展?服务业FDI过度引入是否会造成我国产业的低端化锁定,不利于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甚至威胁我国的产业安全?若真如此,我们该如何对其进行合理引导与规制,使其技术外溢效应得到最大程度发挥,同时又能够有效保护本土产业安全,并最终提高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而这些问题都恰恰是在合理引进服务业外资,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基于此,本文尝试对中国服务业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服务业FDI对服务业竞争力排斥效应以及服务业吸引FDI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以期政府部门引资策略的调整提供一定的政策依据和理论指导。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关于服务业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主要可分为两类观点:一是支持正向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如Francois(1990)研究得出服务业FDI有助于东道国最终产品生产获得更多更好的中间投入以提高生产效率,尤其对制造业表现更为明显。Banga & Goldar(2004)对20世纪90年代印度服务业外资进行了考察,得出服务业FDI对本国工业产出水平的增长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Fernandes(2008)对东欧经济转型期国家服务部门的绩效进行了研究,得出通信、金融等基础部门的FDI有助于东欧国家相关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国内学者薛敬孝(2006)、刘艳(2012)、周文博(2013)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二是不支持正向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如Alfrao(2003)、Nadia & Merih(2011)、方惠(2009)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服务业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其结果甚至有可能是负效应。

国外学者对服务业FDI的竞争效应已进行初步的探讨。主要可分为两类观点:一是支持服务业FDI的竞争效应研究。如Markusen(1989)研究表明服务业FDI会对东道国服务企业产生一定程度上的挤出效应,但竞争加剧又会刺激对服务要素更大的需求,总的来看,服务业FDI的规模效应大于替代效应。Hoekman(2006)研究认为,在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服务质量高低将对该国企业竞争力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一国可以通过引进交通运输、金融、邮电通信等基础服务领域的FDI来加快本国经济发展,以提高该国的经济绩效和促进技术进步。二是不支持服务业FDI的竞争效应研究。如Agosin & Msyer(2000)对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的FDI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FDI对亚洲各国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挤入效应,对拉丁美洲各国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而对非洲各国经济发展却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国内学者如汪旭辉(2006)、宋则(2007)、杨东星(2011)、胡晓鹏(2012)等对中国服务业外资的竞争效应也进行了实证研究,都得出服务业FDI对中国本土服务企业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服务业FDI的效应研究,大多偏好于简单地利用统计数据和计量方法来测算服务业FDI的溢出的存在性或者是正负向作用,缺乏对溢出机制、溢出渠道等方面的深入探讨,尤其是对服务业吸引FDI的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更为稀缺。此外,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也主要是从地区或行业层面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综

合考虑地区与行业层面因素的研究成果不多,从而导致对服务业 FDI 缺乏一个完整的认识。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参照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服务业 FDI 效应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

三、中国服务业 FDI 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服务业 FDI 是一个内含着资本、制度、技术、管理和项目的“打包型”复合投资。当服务业跨国企业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时,其所带来的“一揽子”资源对东道国内资企业产生非资源性技术扩散,而跨国企业又无法获得全部收益。这种经济外部性的直接结果就是引起当地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服务业 FDI 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有多种路径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通过竞争效应产生技术外溢。众多周知,我国服务业开放进程比较缓慢,服务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生产技术和手段相对跨国公司也比较落后,一旦服务业跨国公司进入后,必然会加剧本国服务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而本土服务企业为了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维持原有的市场地位,就会积极加大研发投入或进行管理创新,有效整合现有企业资源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改善服务产品质量,增强自身国际竞争力。此外,我国的一些重要服务部门如金融、通信、保险及交通运输等,这些服务部门大多以国有单位为主体,行政垄断程度较为严重,而服务业外资企业的进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垄断性竞争,在竞争与打破垄断的过程中,外资企业通常为了维护自身技术比较优势,也会被迫引进新的技术,从而导致新一轮的技术外溢。

第二,通过示范模仿产生技术外溢。一般认为,服务业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本土服务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即跨国公司的生产技术、经营理念、营销手法相比本土企业更为先进。一旦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本土企业在面临市场份额被抢占的威胁时,会通过“看中学”和“干中学”的方式向跨国企业进行技术学习、吸收与模仿。同时,跨国企业运用新技术的成功也会给东道国本土企业造成良好的示范作用,降低东道国本土企业运用新技术的成本与风险。比如,东道国本土企业可以通过逆向研究学习跨国公司的技术,或者是直接招揽跨国公司的技术人才。

第三,通过人力资本培训、流动产生技术外溢。人力资本作为服务业的“软件”,是服务业外资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业知识传播的最重要方式。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服务业跨国公司所拥有的技术优势无法脱离人力资本而完全物化在设备和技术上。因此,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有效运营往往需要与东道国人力资本密切配合。而一旦这些训练有素的高级人才或专业技术人员受雇于其他本土企业或者自创企业,将产生明显的技术扩散,增强对地区的技术外溢效果。此外,跨国公司内部人员的外流会迫使其雇用更多的人才进行培训以弥补流失的人才缺口,进而间接放大了技术溢出效果。

第四,通过产业集聚产生技术外溢。跨国公司除了提供纯服务外,通常还会利用技术溢出的前后向关联来强化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竞争力。通过产业的前后向关联,服务业 FDI 不仅会有助于东道国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其经济效率得到提高,而且跨国公司为

了维护自身的企业形象及控制产品的质量,通常还会为国内供应商建立生产性设施,并提供管理与技术上的支持。而服务业产业集聚恰好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特点,进而产生一定的经济外部性,如集聚区域内专业的供应商服务、劳动力资源的共享与知识和信息的交流,这样可以减小企业的交易成本,为企业的技术模仿与创新提供条件,从而间接地提高了集聚区内服务企业的生产效率。

此外,随着国际产业转移从制造业向服务业不断延伸,服务全球化程度得到进一步加深。因此,服务外包作为一种具有高成长性、高附加值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国际分工形式,在全球范围内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中国为例,2012 年承接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 46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8%,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 33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1%,占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市场总额的 27.7%,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服务外包接包国。^① 当然,跨国公司离岸服务外包对东道国本土服务企业的技术溢出同样是基于以上四种溢出渠道。

综上所述,服务业 FDI 主要通过以上四种渠道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并最终作用于东道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如图 1 所示。在以上四种溢出机制中,示范模仿、人力资本和产业集聚效应倾向于对技术溢出产生正向影响,而竞争效应的效果则不能确定,四种效应的综合作用决定了服务业 FDI 技术溢出的程度,进而影响东道国的技术进步。而离岸服务外包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分工形式,是服务业跨国公司的重要载体,对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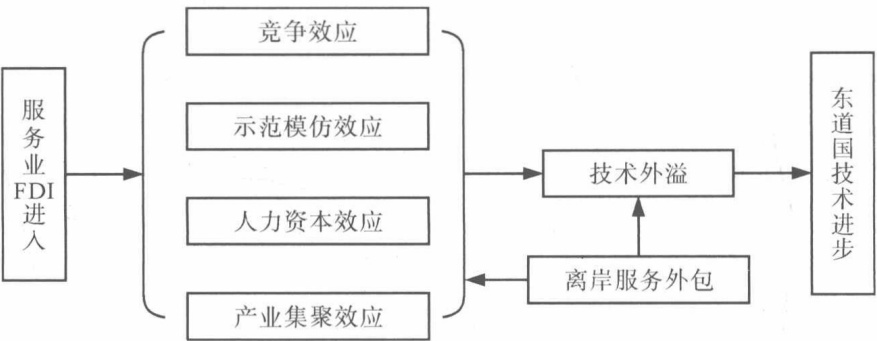


图 1 服务业 FDI 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

鉴于此,提出本文待检验假说 1:服务业 FDI 与地区技术进步呈现正相关,即一国或一地区的服务业吸引 FDI 总量越多,对地区技术进步的正向影响越显著。

(一)模型构建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是衡量技术进步的重要指标,为了考察服务业 FDI 对地区技术溢出效应的程度,计量方程式设定形式如下:

^① 资料来源: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 2013》,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3 年版。

$$TFP_{it} = a_1 + a_2 SFDI_{it} + a_3 EDU_{it} + a_4 R\&D_{it} + a_5 OPEN_{it} + a_6 K_{it} + a_7 Z_{it} + r_i + n_t + \varepsilon_{it}$$

$$i, t = 1, 2, 3, \dots, n \quad (1)$$

其中, TFP 表示全要素生产率, $SFDI$ 表示服务业 FDI 投资额, EDU 表示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R\&D$ 表示地区研发成本投入, $OPEN$ 表示地区对外开放程度, K 表示地区资本密集程度, Z 表示政府对地区经济干预程度; 下标 i 表示地区, 下标 t 表示年份, a_1 至 a_7 为回归系数, n_t 为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 r_i 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显然, 只要判断 a_2 的符号, 就可以得知我国服务业 FDI 是否存在地区上的技术外溢效应。另外, 为了验证该模型, 还需要计算中国各省市的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以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技术进步 A 。目前有三种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 (TFP), 主要包括随机前沿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和索洛残差分析法, 本文则采用索洛残差分析法来估算中国大陆各省市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首先, 假定各省市的生产函数形式是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 即:

$$Y_{it} = A_{it} K_{it}^a L_{it}^{1-a} \quad i, t = 1, 2, 3, \dots, n \quad (2)$$

其中: Y_{it} 、 A_{it} 、 K_{it} 、 L_{it} , 分别为 i 地区第 t 年的总产出、技术投入、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 而 $1-a$ 与 a 分别为劳动与资本的产出弹性。为了便于测算, 这里假设规模报酬不变, 并取 $a = 0.55$ 。^① 因此, 各省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公式如下:

$$A_{it} = Y_{it} / (K_{it}^a L_{it}^{1-a}) \quad i, t = 1, 2, 3, \dots, n \quad (3)$$

(二) 数据来源

由于中国大陆部分省市并没有按照三次产业分类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 因此我们无法获取中国大陆全部省市的服务业 FDI 数据。在剔除数据不全的省份后, 本文共选取了 22 个省市 2001 年至 2011 年的数据^②, 具体用到的指标含义如下:

1. 被解释变量 TFP , 即全要素生产率。按照索洛残值分析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需要用到国内生产总值、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三个变量的数据, 其中, 各省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均来源于各省市的历年统计年鉴, 并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其换算为 2000 不变价格表示的实际值; 劳动投入用从业人员总数进行表示, 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而对于资本存量估算, 目前国内学者还未形成统一的计算方法, 本文则借鉴张军学者 (2004)^③ 的方法, 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进行表示。采用永续盘存法来估算资本存量, 即

$$K_t = K_{t-1}(1-\delta) + I_t \quad t = 1, 2, 3, \dots, n \quad (4)$$

其中, K_t 为资本存量, I_t 为资本投入, δ 为折旧率。这里用各省市历年的固定资产投

① 资料来源: 岳金桂:《基于进口与 FDI 传导机制技术溢出效应: 中国的实证分析》, 河海大学, 2007 年。

② 本文选取了北京、河北、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青海、甘肃、新疆等 22 个省市为研究样本。

③ 资料来源: 张军:《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1952—2000》,《经济研究》2004 年第 10 期。

资总额来表示 I_t ,并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其换算为2000年不变价格表示的实际值,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数据均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 δ 为折旧率,取9.6%。对于基年2000年的资本存量估计,借鉴张军学者(2004)推算出的各省市2000年的资本存量,并将其折算成2000年的不变价格。

2.解释变量 $SFDI$,即服务业FDI投资额。本文以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进行衡量,各省市服务业实际利用FDI的数据均来源于各省市历年的统计年鉴。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福建、山西、甘肃、青海四省没有统计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因此本文以外资合同的执行率即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协议外资额的比重对服务业FDI的协议金额进行数据处理,从而得出其大致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本文预期该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正相关。

3.解释变量 EDU ,即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这里以各省市的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加权平均值来进行表示,具体计算方式为:将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以及研究生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设定为6年、9年、12年、15年、16年和19年,那么各省市的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小学比例 $\times$ 6+初中比例 $\times$ 9+高中比例 $\times$ 12+大专比例 $\times$ 15+大学本科比例 $\times$ 16+研究生比例 $\times$ 19,其中,各省市从业人员的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一般认为,人力资本存量提升有助于学习、吸收并转化国外先进技术,而且劳动者专业技能的提高会优化企业流程管理,并最终提高该产业的生产效率。本文预期该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正相关。

4.解释变量 $R\&D$,即地区研发成本投入。这里用各省市的 $R\&D$ 经费支出来进行表示,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科技数据》。一般认为,研发成本规模大小会对地区企业的技术创新进程造成直接的影响,进而影响地区的技术进步。本文预期该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正相关。

5.解释变量 $OPEN$,即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这里用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该地区GDP的比重来进行表示,数据均来源于历年各省市的统计年鉴。通常认为,一国或一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就越有利于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引进与吸收学习,并进一步加快东道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促进地区技术水平提升。本文预期该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正相关。

6.解释变量 K ,即地区资本密集程度。这里用各省市的资本存量来进行表示,数据均根据各省市统计年鉴整理而得。一般认为,地区密集度越高,越有利于引进先进设备,加快地区技术进步,但也有学者得出资本深化有可能延缓地区技术进步,如张军学者通过研究表明资本深化会阻碍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本文预期该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相关。

7.解释变量 Z ,即政府对地区经济干预程度。这里是用各省市的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进行表示。一般认为,市场化改革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各地区技术水平提升。本文预期该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相关。

(三)实证分析

1.ADF 检验、协整检验

由于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带有随机趋势的非平稳的变量之间经常会发生伪回归现象而造成统计结论失真的结果,因此在进行分析之前,要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运用 Eviews 6.0 计量软件对各个变量进行 ADF 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水平值均是不平稳的时间序列,但其一阶差分在 10% 的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所以,原序列是一阶平稳序列,符合协整检验对时间序列同阶单整的要求,能避免产生伪回归的现象。

Pedroni 协整检验的结果显示,各个统计量均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认为该面板变量的协整关系是成立的,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2. 回归结果分析

在计量模型的处理上,先利用 Hausman 检验来判断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或者是随机效应模型,使用 Hausman 检验判断其有效性时,如果 Hausman 检验值不显著 ($P < 0.10$),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否则选用随机效应模型;接着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EGLS) 进行估计,最终由 Eviews 6.0 回归的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全国、东、中西部地区服务业 FDI 技术溢出的回归结果分析

Variable	模型 1(全国地区)	模型 2(东部地区)	模型 3(中西部地区)
C	0.9577*** (9.2704)	2.8076*** (3.2974)	0.6374*** (5.5832)
SFDI	0.00458*** (6.3275)	0.00788*** (4.7150)	0.00474*** (3.2558)
EDU	0.02547** (2.1350)	0.16354* (1.7779)	0.03422** (2.4610)
R&D	0.00044*** (4.4098)	-0.00013 (-0.3943)	0.00009 (-0.3221)
OPEN	0.26473*** (3.6055)	0.08179* (0.3920)	0.1970* (1.1023)
K	-0.000003*** (-3.2297)	-0.000081*** (-3.2409)	-0.000069* (0.8235)
Z	-0.09741** (-1.9531)	0.00016*** (4.0895)	0.00015** (1.9683)
R ²	0.9683	0.9778	0.8784
Ad R ²	0.9636	0.9737	0.8587
F-Statistic	209.02	236.12	44.56
Modle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注:表中括号内为相应系数的 t 统计值;“*”、“**”、“***”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由回归结果表 1 可知:模型 1(全国地区)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都能够接受检验,而且模型的 R^2 为 0.96,拟合度也比较高,证明了模型是有效的。从

全国地区来看,服务业 FDI 确实存在着技术溢出效应,能够积极地促进地区技术进步,这就验证了假说 1。当服务业 FDI 提高 1 个百分点时,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0.00458 个百分点,这说明了服务业 FDI 作为跨国资本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从我国经济的整个发展进程也可以看出,外资一直以来都是本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人力资本水平(*EDU*)的回归系数为 0.02547,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对地区技术进步有着直接的影响,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对地区技术进步的正向影响越显著。研发成本投入(*R&D*)的回归系数为 0.00044,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研发成本投入规模对地区技术进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地区对外开放水平(*OPEN*)的回归系数为 0.26473,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对地区技术进步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均高于其余解释变量。资本密集度(*K*)的回归系数为-0.000003,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资本密集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即资本深化延缓了各地区技术水平提升。政府对地区经济干预程度(*Z*)的回归系数为-0.09741,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政府对地区经济干预程度过深会明显阻碍地区技术进步,而市场化改革会促进生产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地区经济效率。

为了直接考察服务业 FDI 对各个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差异,本文将整体样本分为东部地区(模型 2)、中西部地区(模型 3)两个层面又进行分别考察。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模型的拟合效果仍然较好,且大部分结论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 FDI 的回归系数也发生变动。通过地区比较来看,东部地区的服务业 FDI 回归系数为 0.00788,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的服务业 FDI 回归系数为 0.00474,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了服务业外资确实具有技术外溢效应,但同时也存在地区上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对东部地区的技术拉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造成地区间技术差距加大。此外,东、中西部地区的研发成本投入(*R&D*)系数均通不过 10%的显著性检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Z*)的系数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与全国总体又有所差别,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系数都为正,且都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四、中国服务业 FDI 竞争排斥效应的实证研究

一般认为,服务业跨国企业在华投资会带来技术外溢效应,与此同时,随着服务业外资在华投资相对规模的不断提高,一旦其超过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承受程度,其会对我国服务业本土企业产生相应的竞争挤出效应,而当外资相对规模超过一定的合理区间时,对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将不再是正向作用。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四点:

第一,从实质上看,跨国公司的大规模涌入,都是以抢占本国国内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但是由于国内市场比较有限,服务业跨国公司对国内市场的抢占将会排斥东道国当地企业的发展。在投资初期,由于外资投资规模与其所占市场份额相对有限,

因此并未与东道国本土企业产生激烈的市场竞争。然而,当服务业跨国企业在国内市场逐步稳定下来后,其绝对优势就会越发明显,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动机必然会促使其与国内本土企业开始竞争,争夺国内原本有限的市场份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本土企业造成竞争排斥,降低其生产与出口的能力。

第二,目前我国整个产业体系仍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服务业同样也不例外。因此,这样的国际市场格局造成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优势主要是在中低端层面,尤其是近些年来服务外贸快速发展,中端产品的竞争优势已越来越明显。但是,随着高端服务业外资的进入、对国内市场的挤占和产业价值链的延伸,原本在中端市场具有比较优势的本土企业将不得不退出原有市场或转向更低层次的其他市场,从而影响了竞争力提升。对此,寇宗来(2009)、Aitken & Harrison(1999)都有类似的研究发现,即当 FDI 进入东道国之后,许多本土企业将逐步放弃与 FDI 竞争,主动采取产品低端化以获取利润。

第三,与东道国本土企业相比,跨国公司往往能够提供更加完善的人才培训机制和丰厚的薪资待遇,从而能够吸引大量高端人才的流入,这样必然会造成本国服务人才的流失,即高端服务人才不断从本土企业向外资企业流入,致使本土企业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都被严重削弱。这不仅不利于本土服务企业学习并吸收外资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降低服务业 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而且流失的人才可能还会带走企业内部的核心技术和关键信息,从而降低企业的竞争力,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

第四,长期以来,我国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一直被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边缘化,一直处于落后的模仿追随状态,陷入“以市场换技术”的恶性循环当中,这样不仅会使国内本土企业承受巨大的成本上升压力,而且面临着国内市场被跨国企业瓜分挤占的风险,更糟糕的情况是,本土企业会对国外先进技术产生过度依赖,从而削弱了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长此以往,本土企业可能会长期受制于人,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条件,最终无法有效实现技术赶超的目的,并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中的低端位置。

由此可知,服务业外资的大规模进入,以及在外资规模、外资结构、投资流向、投资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会长期作用于东道国本土企业的资本、技术、人才、经营理念等各个因素。一旦外资规模超过合理的界限即过度引资时,外资的竞争排斥效应就会超过溢出效应占主导,从而降低东道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如图 2 所示。

鉴于此,提出本文待检验假说 2:服务业相对引资规模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存在非线性关系,即服务业外资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内,会对东道国的服务业竞争力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而一旦超出合理的区间,将不利于东道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一)模型构建

假定本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Y)是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X)的函数,即: $Y=f(X)$ 。为了分析服务业外资对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本文用 RCA 指数来表示本国的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水平,用服务业外资总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SFDI/I$)来表示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在计量模型回归方程的设定上,本文引入了二次方项,具体计量模型设定形式如下:

$$Y_t = f(X_t) = b_1 + b_2 X + b_3 X_t^2 + \epsilon_t \quad t=1,2,3,\dots,n \quad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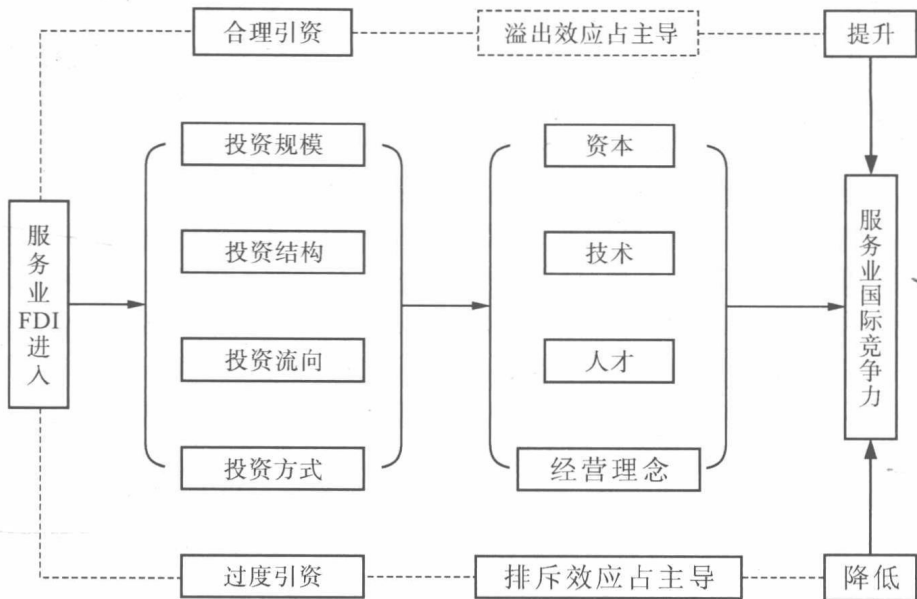


图2 服务业 FDI 对东道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分析

其中, Y_t 代表服务业国际竞争力, X_t 代表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 b_1 至 b_3 为回归系数, ϵ_t 为随机扰动项, t 表示时间年份。

(二) 数据说明

为了考察服务业 FDI 对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本文选取了中国 1995—2012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涉及的相关指标含义如下:

1. 被解释变量 Y , 即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RCA 指数)。该指数是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 (Balassa Bela) 于 1965 年测算部分国家贸易比较优势时采用的一种方法, 可以反映一个国家 (地区) 某一产业贸易的比较优势。该指数通过某一产业在该国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与世界贸易中该产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份额之比来表示, 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 能够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某一产业的出口与世界平均出口水平比较来看的相对优势。其计算公式如下:

$$RCA_{ij} = (X_{ij}/X_j)/(X_iW/X_tW) \quad i, t = 1, 2, 3, \dots, n \quad (6)$$

其中, X_{ij} 表示国家 j 出口产品 i 的出口值, X_j 表示国家 j 的总出口值; X_iW 表示世界出口产品 i 的出口值, X_tW 表示世界总出口值。

一般认为, 一国 RCA 指数大于 2.5, 则表明该国该产业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 RCA 介于 1.25 至 2.5 之间, 表明该国该产业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RCA 介于 0.8 至 1.25 之间, 则认为该国该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RCA 小于 0.8, 则表明该国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其中, RCA 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 2013 服务贸易统计报告^①和

①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http://www.mofcom.gov.cn/>。

WTO Statistical Database^①。

2.解释变量 X ，即服务业外资的相对规模。服务业 FDI 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并根据当年的汇率中间价折算为本币计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I 的数据同样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 1995 年和 1996 年没有服务业 FDI 实际利用额的统计，所以依照前文的处理方法采取契约的执行率测算出该年份的服务业 FDI 实际利用额。

(三)实证分析

1.ADF 检验、协整检验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ADF 检验表明，三个变量的水平值均无法通过平稳性检验，而一阶差分均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所以，原序列是一阶平稳序列，符合协整检验对时间序列同阶单整的要求，能避免产生伪回归的现象。

在时间序列数据下，只有当协整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才能说明各变量之间满足协整关系。采用 ADF 方法对协整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单位根，即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因此，回归方程中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是成立的，即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用 Eviews 6.0 软件对三个变量进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经过分析可以发现：(1)当滞后阶数为 1 阶时，服务业相对引资规模(X)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Y)的 Granger 原因，而服务业国际竞争力(Y)不是服务业相对引资规模(X)的 Granger 原因。(2)当滞后阶数为 2 阶时，各个统计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二者不存在 Granger 因果关系。(3)当滞后阶数为 3 阶时， X 不是 Y 的 Granger 原因，而 Y 才是 X 的 Granger 原因。因此，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相对引资规模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的 Granger 因果关系。

2.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 Eviews 6.0 统计软件的回归，得到表 2 的回归结果：

表 2 服务业 FDI 竞争排斥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Error	t-Statistic	Prob.
C	0.32	0.032	10.007	0.000
X	12.90	2.781	4.637	0.001
X ²	-141.4	50.585	-2.795	0.014
R ²	0.91	Mean dependent var		0.524
F-Statistic	71.02	Durbin-Waston stat		2.422
Prob	0.00	—	—	—

资料来源：根据 Eviews 6.0 的统计结果整理所得。

①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官方网站数据库：<http://stat.wto.org/Home/WSDBHome.aspx?Language=E>。